

高句丽历史研究

刘子敏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延吉

序 言

朴文一

高句丽是公元前1世纪初至公元7世纪中叶间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建立的一个古代国家，它无论是在中国史还是在朝鲜史或是中朝日古代关系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研究高句丽历史，一向是中外史学界非常重视的重要课题，同时业已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我国近代，对高句丽问题的研究乃发端于一百余年前发现的好太王碑研究。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其研究空气更为活跃。这些研究，涉及到了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的方方面面，有政治、经济、制度、族属、疆域、文物、文化、宗教、对外关系等等，使其研究内容确实拓宽很多，从而使高句丽研究成为一门学科——“高句丽学”。但是，作为专门著作的出版，虽然包括好太王碑研究在内的在国内也有几部，但其数量还是偏少，因此，这次刘子敏同志所著《高句丽历史研究》一书的问世，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刘子敏同志文史兼备，不仅在古汉语、古文献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而且在东北亚古代史的研究方面也有些独到的见解。近几年他在《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北方文物》、《延边大学学报》等十几家学术刊物中发表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对古辽东、古燕国、古朝鲜、战国秦汉时期的辽东郡以及存在于辽东地区的貊族、貊国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进一步探讨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有益的。

《高句丽历史研究》一书，不仅是刘子敏同志近几年在高句丽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综和整理，而且也有新的发挥和提高，有独树一帜之处。例如，关于高句丽的族源问题，作者认为这一民族最早是脱胎于今浑江流域的古高夷，而古高夷既非秽族，亦非貊族，而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独立的土著古族，夫余人、貊人、汉人等其他民族加入高句丽，则是后来的事情。再如，关于高句丽故地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包括古高夷和古貊国的土地，它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纳入了辽东郡的辖区，而在西汉昭帝时才从辽东郡中分离出来，另立玄菟郡（即第二玄菟郡）。其他问题，诸如“古高句丽”的存在及其分布地域、高句丽五部的形成、高句丽早期王系、高句丽灭亡的原因及其在中朝古代关系史中的重要地位等，都与传统的看法有别，读后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史学研究同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其成果是由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经过艰苦的劳动而取得的。刘子敏同志的《高句丽历史研究》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尤其在吸收国内成果方面，显得更为突出。特别强调的是，该书在论证问题时一方面善于对文献史料进行科学的辨析，另一方面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加以证实，其说服力比较强。当然，既是学术研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同一问题产生一些不同看法，乃是非常正常的。搞学术，应当允许学者们各叙己见，否则，学术就达不到繁荣，问题也不会得到科学的解决。我相信，《高句丽历史研究》一书的出版，很可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某些兴趣，而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也会有一定的启示。

1996年9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高句丽的族称和族源	1
第一节 高句丽的族称	1
一、关于“高句丽”名称的含义	1
二、对高句丽族称诸说的辨析	3
第二节 高句丽的最早源头“高夷”	9
一、高夷的地理位置	9
二、高夷地区的考古文化	13
三、高夷地区被纳入战国辽东郡	19
第三节 关于“古高句丽”	29
一、“古高句丽”的形成	29
二、“古高句丽”的居地	34
三、沸流国与古高句丽	38
第四节 朱蒙建国与五部的形成	43
一、朱蒙建国神话的演变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实际	43
二、高句丽五部的形成	56
第二章 高句丽前期社会	75
第一节 高句丽的政治体制	75
第二节 高句丽的社会经济	79
一、土地所有制及社会性质	79
二、农业生产	82
三、渔猎及饲养业	86
四、建筑业	89

五、手工业	99
六、商业	105
第三节 高句丽的文化	107
一、中原典籍的传入与汉字的使用	107
二、中原哲学思想与宗教的传入	110
三、高句丽的自然科学	113
第四节 高句丽的礼俗	115
一、饮食	115
二、服饰	116
三、婚俗	116
四、葬俗	118
五、祭祀	120
六、其它	126
第三章 高句丽前期王系考辨	129
第一节 史学界在高句丽王系问题上的分歧	129
第二节 闻达、如栗、莫来考辨	133
第三节 宫、遂成、伯固考辨	138
一、太祖王宫的在位时间	138
二、遂成与伯固的在位时间	141
第四节 男武、伊夷模、位官辨	147
一、伯固死后王位的继承者	147
二、伊夷模即为延忧辨	151
三、位官考辨	153
第五节 关于故国原王钊的谥号	157
第四章 高句丽历史地理	162
第一节 对在高句丽故地归属问题上的	
几种错误说法的辨析	162
一、第二玄菟郡是第一玄菟郡之缩小说	162

二、高句丽故地曾属真番郡说	171
三、高句丽故地曾为古朝鲜属地说	181
第二节 高句丽山水考释	188
一、高句丽的山	188
二、高句丽的水	193
第三节 高句丽的交通	213
一、高句丽故地的“南北道”	213
二、高句丽故地的其它通道	218
三、高句丽后期的交通	220
第五章 高句丽后期历史	230
第一节 高句丽同南北朝的关系	230
一、接受南北朝的册封	231
二、履行向南北朝进贡的义务	232
三、高句丽强盛不受制	232
四、灵活的交往策略	233
第二节 高句丽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235
一、大量汉族融入高句丽族之中	236
二、从高句丽壁画墓的产生和发展看其对中原文化的 继承和发展	237
第三节 鼎盛时期的高句丽	242
一、实行郡县管理的政治制度	243
二、高句丽实行租税制度	243
三、高句丽的铁器生产	244
四、高句丽礼俗的变化	244
五、在文化上的普遍中原化	245
第四节 高句丽灭亡的原因	247
一、隋丽战争及高句丽力量的消弱	247
二、盖苏文政变及高句丽内部的分裂	248

三、高句丽东北亚政策的转变及所带来的危机	248
四、唐朝在高句丽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与 在朝鲜半岛政策方面的转变	250
第六章 高句丽在古代中朝关系中的历史地位	254

第一章 高句丽的族称和族源

第一节 高句丽的族称

一、关于“高句丽”名称的含义

“高句丽”之名最早见于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条：“县三：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班固在玄菟郡下有注云：“高句骊，莽曰下句骊，属幽州。”班固在《地理志》中还说：“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涉貉、句骊蛮夷。”如果我们仅就上述记载来看，似乎“高句骊”仅是县名，而“句丽”则为族名。但是，《汉书·王莽传》却云：“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州郡归咎于高句骊。……尤诱高句骊侯駘而斩焉……莽大说，下书曰：‘……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又知“高句骊”除了县名之外，也是族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确认，在西汉时期，“高句骊”既是县名又是族名。而从各种迹象表明，“高句骊”最早应是族名，后来在高句骊族分布区又置高句骊县，故而县名应来自族名。另外，我们从《汉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作为族称的“高句骊”，有时也称为“句骊”，显而易见，“句骊”应是“高句骊”的简称。学界有人认为“句丽”和“高句丽”的出现应有先有后，在高句丽故地曾存在着一个先行于

高句丽的“句丽国”。^① 还有的学者认为“高与句实际上是重音连绵字，高、句为双声字，高即是句，句也就是高，两字又可连署，又可单称，并不影响词义，高句丽通作高丽或句丽就是确证。”^② 这两种说法都是欠妥当的。我们从《汉书》的有关记载看，并没有发现“高句骊”和“句骊”出现时间有什么先后之别，至于在朱蒙建国之前是否存着一个“句骊国”，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谈及，但应强调的是，在“高句丽”作为国名之前，其作为族名和县名业已存在了。关于“高”和“句”应为双声字，当是事实，但“高句”合在一起并不是连绵词，实际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也并不成其为词。“高句丽”的组合应是“高十句丽”，而不是“高句十丽”。“高丽”和“句丽”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

其实，“高句丽”这一族称的来源，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完全能考证出来。王莽能将“高句骊”更名为“下句骊”，说明“高”应是汉语“高下”之高，西汉时期人们的这种认识是不会错的，“高句骊”可更为“下句骊”而不能改为“下骊”，因为在西汉时作为简称的“高丽”尚未出现。关于“句骊”，笔者认为它应是高句丽语“沟瀆”的同音异写。《三国志·高句丽传》云：“沟瀆者，句丽名城也。”有的学者将“名城”解释为“著名的城”，是不妥的。笔者认为，“名”字在这里是用作动词，“沟瀆者，句丽名城也。”是个判断句，意谓“沟瀆是高句丽人对城的称谓”，也就是说，“沟瀆”是高句丽语的音译词，汉语的意思是“城”。因此，若说“沟”和“句”是同音字，“瀆”和“丽”是双声字，还是符合实际的，“沟瀆”亦即“句丽”，二者是一个词或一个概念，在它的前面再加上一个汉语形容词“高”，就成了“高句丽”这样一个合成词，意谓

^① 姜仁淑著、文一介译：《关于先行于高句丽的古代国家句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长春）1992年第1期。

^② 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建筑于高山上”的城堡”。众所周知，高句丽的早期城堡都是山城，高句丽族就是善于在高山之上建筑城堡的民族。“高句丽”之名不仅反映了高句丽族的某些特殊习俗、特殊文化，同时也反映了高句丽族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就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句丽族称已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由于“句丽”在字面上要比“沟渎”美，在作为族称出现之时，仅写作“句丽”或“句骊”而不写作“沟渎”了。“丽”与“骊”应为同音字，将“高句骊”写成“高句丽”，并非奇怪的事情，二者在意义上也并没有什么区别。

二、对高句丽族称诸说的辨析

关于高句丽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中外学者有许多说法，而这些说法又多过于附会，因此笔者试一一辨析之。

（一）“槁离”说

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高句丽”这一称呼来自于汉代学者王充《论衡·吉验篇》中的“橐(亦写作槁)离国”，^①而《魏略》中的高丽作“槁离”，^②“魏时所称之槁离，音近句丽，当即古之高夷，亦即后汉书之高句骊”。^③这种将“槁离”生硬地同“句丽”或“高丽”扯在一起的作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要知道，王充所记之“橐离”国是夫馀开国者东明的故乡，应在夫馀之北，而从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夫馀又在高句丽之北，夫馀是高句丽开国者朱蒙的故乡，怎可将“槁离”同“句丽”、“高丽”混为一谈？《魏略》所载之“槁离国”见于《三国志·夫馀传》注引，说“旧志又言”等等。所谓“旧志”，当指《论衡》而言，鱼豢所言之槁离国亦即王充所言之

^① 李俊永：《关于高句丽国家的起源》，朝鲜《历史科学》1964年4月。

^② 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1期。

^③ 金毓黻：《东北通史》81页。

橐离国，而所叙述的乃是夫余建国神话，而不是高句丽建国神话，把两个神话等同视之，是不妥当的。再说，后人将“橐离”写成“槁离”，当是一种笔误，这就更不能将“槁离”同“句丽”、“高丽”视为一个族称了。从音韵学的角度看，“高”和“槁”应是同音字，但“槁”同“橐”的读音就大不相同了。“橐”字在上古是舌音，透母，铎韵，而“槁”字则是牙音，见母，宵韵。因此，“槁(高)”同“橐”的上古音，既不是双声，又不是叠韵，而后人将“橐”写作“槁”，纯属字形相近而致误，若将误写的“槁离”同“句丽”、“高丽”相提并论，岂不是笑话？

(二) “山高水丽”说

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高丽亦取山高水丽之义，盖山水之胜，甲于天下”。^① 这种说法，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试想，山水之胜而甲于天下者，何止高句丽一个民族之居地？再说，用“山高水丽”可解释“高丽”，但对“高句丽”、“句丽”、“高骊”又如何解释？

(三) “高大黑马”说

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古代称黑马为骊”，“高骊即高大的黑马，可能由夫余的马图腾氏族演变而来的”，^② “到高丽建国以后，国王喜骑骊马而取名为高骊”。^③ 这种说法，亦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就字面而言，“高骊”当然可以解释为“高大的骊马”，但这种解释同样与“句丽”、“高句丽”贴不上谱，若说高句丽建国前称“高丽”而建国后又取名为“高骊”，这在文献学上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根据。如前所述，“高丽(骊)”应是“高句丽”的省称，在史籍中出现较晚，而最早记载“高句骊”或“句骊”这一名称

①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一。

② 傅朗云等：《东北民族史》4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③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43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的《汉书》，并没有区分建国前和建国后的这一族称或地名、国名有什么不同。再说，从文献记载看，高句丽地区的特种马并非什么高大的黑马，而恰恰是一种矮小的“果下马”。《北史·高丽传》云：“（高句丽）出三尺马，云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后汉书·秽传》云：“（秽）有果下马。”李贤注曰：“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三国志·秽传》亦云：“（秽）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裴松之按云：“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见《博物志》、《魏都赋》。”从史书的记载中可知，不仅高句丽地区产果下马，而且东秽也产果下马，而东秽曾是高句丽国的附属之地，因此，我们说果下马应是高句丽地区的特产，而骊马却不是高句骊地区的特产，将“高骊”解释为“高大的黑马”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至于果下马与夫馀的图腾有何关系，从目前看来并没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就目前学界的研究看，果下马的产地有我国的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包括海南岛）地区、东北的通化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我国西南地区当是其源，^①而夫馀地区在当时是否有果下马，并没有人谈及此事，但就《三国志·夫馀传》所记夫馀“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来看，夫馀地区似乎并没有什么“果下马”。

（四）“介莱”说

持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高与介古音相近，可通转互代”，“高密犹言介密”，而“东夷介国之地，春秋时期又称高密”；“高丽之丽为莱转，莱音先秦正读如今音之丽……所以丽莱音通互转”，因此“高丽本字为介莱，介即我国上古之介族，姜姓，炎帝裔。……莱即我国上古强族莱夷，……知其为姜姓，炎帝裔”，可见“高丽一名为复合族称，高丽民族的主体即由同姓、同一族

^① 侯文通：《我国矮马源流简析》；王铁权：《中华果下（矮）马的古生物学及考古学的研究》，皆见《农业考古》（南昌）1990年第2期。

系的介、莱两族所组”。^① 关于高句丽的族源，下文将有详细阐述，此处不欲多说，但就作为族称的“介莱”之说，此处试略加辨析之。从音韵学的角度看，“高”与“介”在上古皆为牙音，见母；“丽”与“介”、“丽”与“莱”可视为双声字，但并不能据此而认为高句丽族称与古介国、莱国就有什么必然联系。已如前说，“高句丽”的组合单位应是“高+句丽”而不是“高句+丽”。“句丽”是“高句丽”的省称，所省略的是“高”字，而“高丽”也是“高句丽”的省称，所省略的是“句”字。“高丽”之名出现较晚，由于人们对“高句丽”的真实含义已了解得不甚清楚，简化后的“高丽”已不再具备“高山上的城堡”之意义了。因此，用后来的省称“高丽”去附会“介、莱”之国，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再说，古文献之中并无认何“介国”称为“高国”或“莱夷”称为“丽夷”的记载，东北亚地区不见以“介”和“莱”命名的古族；至于说今山东半岛莱阳市境有“高丽山”，今东北地区尚有称高丽为“高莱”者，亦皆不能作为高句丽族称与古之介国、莱国有什么瓜葛的证据。对山东半岛的“高丽山”的来龙去脉，笔者尚不知晓，但就其名称而言，起码也是产生于高句丽、句丽的称呼之后而不是在前，“高丽山”的名称，也许与高句丽族的居民迁移于此处有关，也可能与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居民同山东半岛的来往有关，但它与高句丽族的起源并无必然联系。“高莱”的提法，不知有何依据，笔者长期生活、工作在延边地区，未曾听说过还有将“高丽”称为“高莱”者，虽有类似“高莱”的口语，但那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骂人话，不足取焉！

（五）“高台建屋”说

持此说法的学者，认为“高夷”或“高句丽”中的“高”字，一方面同古之“高辛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高夷人因擅长在土台上建

^① 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2年第1期。

筑木屋有关，“丽字很似两屋并列，似一屋住人，一屋畜养牛豕禽畜，今朝鲜族人甚爱清洁，建屋也往往建于土台上，人畜分成两屋，正象高丽之意”。^① 关于高句丽的族源是否与高辛氏有关，以及高句丽族与朝鲜族有何关系，笔者在后文将详细谈及，在此亦不想多说，但就“高丽”同在高台上建筑房屋是否有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说文》：“麗，旅行也。”段注：“此麗之本义。其字本作丽，旅行之象也，后乃加鹿耳。”《说文》又云：“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段注：“此说从鹿之意也。见食急而犹必旅行者，义也。”现在的简化字“丽”，乃是繁体“麗”之本字，但无论是哪个字，都没有“两屋并列”的意思，“丽”下加“鹿”，也看不出哪是住人，哪是住畜的屋子。又，古代“麗”与“櫛”同，是屋栋的意思，但屋栋还不是屋，与“两屋并列”也不是一回事。所谓“高丽”是“高台建屋”，恐怕是杜撰，并无切实之根据。

（六）“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说

持此说的学者认为，“高句丽”三字，“句丽”可单列，为其族称本义，前面冠以“高”字，应系方位词；“句”是象形字，小篆所书，其字体呈勾曲纡回之状，而“丽”字为会意字，本义为双足并行；因此，高句丽就是“以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之民族”。^② 这种说法，对“句”和“丽”的字面本义的解释并不错，但是，如果这两个字的本义结合起来解释“句丽”这一族称的含义，那就过于附会了。清人段玉裁在《说文》句字条下注云：“凡地名有句字者，皆为山川纡曲，如句容、句章、句馀、高句骊，皆是也。”段玉裁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武断，属于汉语词汇带“句”字的地名，可能含有“山川纡曲”之意，但用汉字记录的音译地名，就不能作如此理解了。因此，认为“高句丽”意谓“以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同前

①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438页。

② 王绵厚：《古代高句丽族称探源》，《辽海文物学刊》（沈阳）1987年第2期。

面分析的“高山水丽”、“高大黑马”、“高台建屋”的说法皆犯同一毛病，皆为望文生义附会之说，不足取。

（七）“铜”或“黄铜”说

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朝鲜语“铜”和蒙古语“黄铜”的发音与“句丽”相近，因此高句丽可能就是“铜”或“黄铜”的意思，而“高句丽”则为“黄铜之国”。^①用现在的朝鲜语和蒙古语音训高句丽族称，恐怕不太妥当。因为高句丽语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而它同现在的朝鲜语、蒙古语又有什么异同，亦尚未有谁能说得清楚。古文献中极罕见记载了高句丽几个词语，如“沟瀆”、“置(买)沟瀆”、“位(汉语“相似”之意)”等，但高句丽语的大致情况，目前尚是空白，单凭想当然论事，恐很难作到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至于高句丽是不是一个盛产铜或黄铜的地区或国家，倒是可以进行研究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后文有所涉及，此不赘述。

（八）“中京”或“中国”说

认为“高句丽”原音为“kauli”，其意为“中京”或“中国”，而“kauli”、“中国”、“高句丽”是同意词的异写。^②“高句丽”在读音上同“中国”、“中京”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在汉字音译中很难看得出来，而古代“高句丽”的音、义，笔者在前面已经谈过，此说与笔者的看法不符，故弃而不取。

（九）“首邑”或“上京”说

持此说法的学者，认为“高”为“首位”之意，“句丽”则为高句丽语中的“golo”，用汉语音译为“忽”，而“忽”为“城”，即“城邑”或“国邑”之意，因此“高句丽”的本义为“首邑”或“上京”。^③关于

① 李址麟：《古朝鲜研究》，朝鲜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 申采浩：《韩国上古史》上 126页。

③ 李丙焘：《韩国古代史》上 217页。

汉语的“城”在前面已说过，高句丽语读为“沟婆”，亦即“句丽”，“高句丽”的正确理解应为“高城”，解释为“首邑”或“上京”，与原意不符。再说，高句丽族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地域狭小，经济落后，其居住区或所筑山城谈不上会有“首邑”、“上京”这样显赫的称号。

将“高句丽”释为“高城”，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①但具体情况笔者尚不知晓，前面发表的意见当是自己的一点理解，是否恰当，有待方家指正。

第二节 高句丽的最早源头“高夷”

一、高夷的地理位置

高夷是高句丽族的先人，几乎已成为中外学界的通说或定说，笔者对此也不予置疑。但是，高夷的地理位置究竟如何，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将高夷同槁离混为一谈，有人认为高夷乃是从山东半岛迁徙而来，这些说法都不能正确地考察高夷存在的时间和分布的地域。笔者认为，既然承认高夷是高句丽的先人，而高句丽的发祥地又是今浑江流域，那么我们就应到浑江流域去寻找古代的高夷遗迹。

“高夷”之名仅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高夷嘼羊。嘼羊者，羊而四角。”晋人孔晁注曰：“高夷，东北夷高句骊。”孔晁是最早认为高句丽来源于高夷的学者。那么，我们如何探讨高夷的存在时间和地理位置呢？笔者认为，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应从《逸周

^① 据说孙进已先生即持此观点，见《东北民族史》油印本第二编第一章，但这份材料至今笔者尚未见到，因而具体问题尚不得而知。

书》的记载谈起。

《逸周书》原名《周书》、《周史记》，相传是孔子删定《尚书·周书》之后所摒弃剩余的资料，故曰《逸周书》。该书尽管有些篇目有些问题，但大部分应是周代史官所记，其史料价值还是很重要的。《王会篇》记载了许多古族古国，文字古朴简洁，是研究东北亚古代民族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弥足珍贵的史料。

笔者认为，《王会篇》所载之古族，同高夷相关联的主要有发人、秽人、良夷、稷慎。关于发人的分布情况，笔者曾进行过专门考察，认为古文献中所记东北亚地区的发、发人、北发、毫、貉、貊皆为同一族称的同音异写，《诗经·韩奕》中的追(秽)、貊同《管子·小匡篇》的秽、貉都是指辽西之貊，他们应在辽西的东北地区，在齐桓公北伐之后，同屠何、孤竹(一部分)、箕族(一部分)等与东胡相融合，皆成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而《左传》昭公九年所载“燕、毫”之毫、《大戴礼记·五德篇》中所载之发、同书《少闲篇》所载之北发、《逸周书·王会篇》所载之发人以及《管子·揆度篇》和同书《轻重甲》中所载之发等，皆指辽东之貊；在东胡占领辽西之后，貊人的分布区应是西起今医巫闾山，东至今清川江一带，《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记之貊国，是指位于今朝鲜慈江道一带的由貊人建立起来的部落小国，它北邻高夷，鸭绿江是其天然界线，南邻箕氏朝鲜，清川江是其天然界线，东邻天毒(即沃沮)，今狼林山脉是其天然界线。^①由此看来，《逸周书·王会篇》中的发人亦即貊人，其分布区主要在中国辽宁省的中部、东部以及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北地区。

关于“秽人”的分布区，我们可用“逆推”的方法而得知。据史书记载与考古文物得知，汉代的夫馀、沃沮、东秽等族都是秽系

^① 刘子敏：《貊族考》，《北方民族》（长春）1996年第1期。